

# 合理利用外商投资 助推民族地区脱贫

吴锡皓, 扈恩萌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海南海口 570228)

**摘要:** 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经济基础, 外资在提供发展资金、产生集聚效应的同时, 还可能带来“溢出效应”, 有助于民族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然而, 外商资本投入的溢出效应存在一定的门槛。该文针对目前中国民族地区外资投入总体不足、利用不合理的状况, 分析了其成因, 并就如何合理利用外资, 最大限度的利用溢出效应、规避不利影响, 推动民族地区脱贫给出意见。

**关键词:** 民族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 溢出效应; 区域发展

**中图分类号:** F7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2404(2017)80-0048-07

## 1 外资投入对民族地区发展的意义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民族问题一直备受党和国家关注, 而经济基础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并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 东部地区, 尤其是沿海地区, 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差距却越拉越大, 民族贫困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发展。

从现实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 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资金短缺(李绪鹏等, 2006), 助力民族地区脱贫, 最关键的是解决资金短缺问题。一般而言, 主要有通过自身发展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和其他资本投入三种途径, 其中, 其他资本投入包括国内资本和国外资本。下面我们具体分析在民族地区发展中, 不同解决资金短缺途径的效度。

### 1.1 自身发展进行原始资本积累

目前, 中国学界对民族地区范围的界定涵盖广西、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和内蒙古八个省区。自建国以来, 它们就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 也一直是党和国家“扶贫”、“减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由于多方原因, 这些地区普遍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技术落后、生产粗放, 经济增长缓慢, 单纯依靠其自身发展进行基本积累、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实现脱贫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 1.2 政府财政投入

经验表明, 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以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进而达到脱贫目的并不可行。首先, 在财政资金使用的过程中,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动机冲突,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 具体表现为由负责官员不作为导致的资金利用率低下, 甚至侵吞国有资产等现象。其次, “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 以中国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为例(单德朋, 2013), 自 1986 年国务院扶贫办成立以来, 虽然民族地区贫困现象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其高返贫率也不容忽视, 同时, 既往减贫成果对政策性扶贫、转移支付的倚重较大; 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不足, 在经济增长减贫效应趋于下降的背景下, 民族地区有陷入慢性贫困和空间贫困陷阱的危险。对此, 中国的扶贫政策先后经历了从“普遍扶贫”到“精准扶贫”再到“助力脱贫”的转变, 扶贫措施上也从单纯给予贫困者最低生活保障、提供廉租房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 转变为同时为其提供就业岗位、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其个人生存能力的综合性措施。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如何推动政府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 扮演好“看不见的手”的角色, 是推动民族地区脱贫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

### 1.3 外部资本投资

建国以来, 财政补贴和国内资本投入一直是中国很多地区得以获取资金、谋求发展的主要途径。直至 1978 年改革开放, 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日益改善的软硬投资环境, 吸引了大批外商来华直接

收稿日期: 2017-05-09

作者简介: 吴锡皓, 博士, 副教授, 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实务等方面的研究; 扈恩萌, 在读硕士, 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实务等方面的研究。E-mail: xihao\_wu@hainu.edu.cn

投资,世界许多著名跨国公司也纷纷来华抢滩登陆(张建华,2003),国外资本正式登上中国发展的舞台。

经济全球化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致力于国外资本引入对于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1960年,MacDougall 在分析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下称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而产生的福利效应时,首次提出溢出效应的概念。Johnson(1972)认为,FDI带来了“打包的资本、管理技术和生产技术”。换言之,实际上,FDI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本,是涵盖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知识、管理经验等一系列生产要素的广义资本概念。实践表明,国外资本的大量流入往往会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如引入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总体素质,加剧当地市场竞争、促进创新和产品质量提升,增加当地企业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产生集聚效应,提高城镇化水平,等等。中国学者张建华和欧阳轶雯(2003)在以广东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检验外商直接投资中技术外溢现象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也发现,外资与内资存在质量差异,国内企业对外资的利用效率要远高于其他国内资本。也可以说,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较国内资金而言,外资更能推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然而,众多大量承接国外资本投入的地区中,也有部分未达到发展预期,甚至由于发展不当产生一系列遗留问题,迫使学者做出进一步研究。Borenztein(1995)认为,FDI的溢出效应存在门槛,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劳动技术以及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水平时,溢出效应才会存在。换言之,当被投资地区自身实力太弱、与投资方差距过大时,国外资本流入产生更多的是“掠夺效应”,真正的受益者只有投资方本身;只有当被投资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FDI流入才称得上是“公平交易”,双方才能达到互利互惠、实现双赢。

科技时代,如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助推民族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在十三五规划的指导下,西部民族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外资本,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成本洼地”优势,抓住“一带一路”倡议契机,实现地区脱贫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而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溢出效应、规避掠夺效应,是值得深入研究跟探讨的问题。

本文的第二部分简述目前中国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的现状,并剖析成因;第三部分就如何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进行探讨,并指出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 2 民族贫困地区利用外资现状及成因剖析

### 2.1 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现状

#### 2.1.1 总量不足,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商直接投资额不断增大,尤其是2006年以来,中国FDI总流入急剧增长。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见图1),近年来,外商投资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的外商投资额虽有增长,但总量上并不显著;且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民族地区同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额差距越来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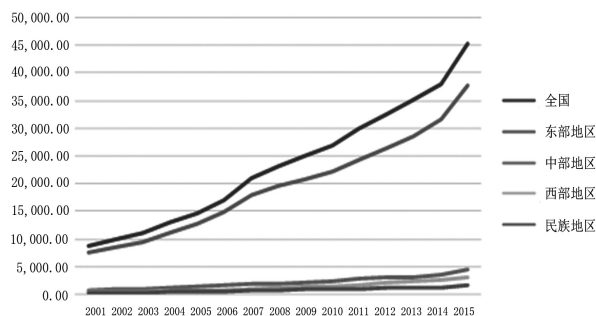


图1 2001-2015年中国不同地区FDI总量及趋势变动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2015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45390.20亿美元,其中,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流入37805.63亿美元、4542.24亿美元和3042.32亿美元,而民族地区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仅为1554.22亿美元,占比不足全国的3.43%,总量上不及东部地区的二十分之一,民族地区的外资投入严重不足,远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且低于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 2.1.2 省份间分布不均衡,省际差异大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在民族地区间,各省份的外资投入量也有显著差异。2015年中国民族地区的FDI总量主要由广西、内蒙古和云南三省驱动,外资投入量分别为425.29亿美元、351.42亿美元和327.20亿美元,累计占比高达71%;贵州次之,FDI总量为181.47亿美元,占比约为12%;而青海、宁

夏、新疆和西藏四省则相对落后,外资投入总量仅为268.84亿美元,不足广西一省的70%,民族地区占比约为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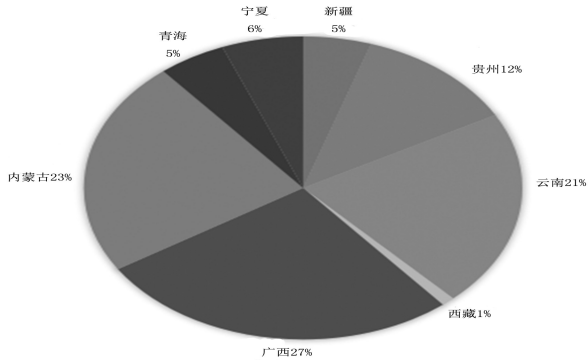


图2 2015年民族地区PDI总量贡献率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 2.1.3 外资企业数量较少,竞争不足

中国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外商投资企业数量众多、竞争激烈,与之相比,民族地区外资企业竞争不足。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中国共有外商投资企业481179家,年度内户均投资额约为943万美元。其中,东部地区外商投资企业407446家,年度内户均投资额约为927.86万美元;而民族地区共有外商投资企业15338家,年度内户均投资额约为1013.31万美元。远高于东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

外资企业数量少、竞争不足可能会导致外资在利用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衍生问题,如投资项目质量差、引资成本高、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同时,由外资项目引发的环境问题、生态破坏等,也不容忽视。李华敏、岳星星(2014)在实证分析检验FDI溢出效应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关系时也发现,中国西部地区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一些小的投资项目上,普遍存在效益水平低、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等现象。

## 2.2 民族地区外资利用现状的成因分析

毫无疑问,民族地区外资投入严重不足、省际差异大、利用不合理的现状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我们将从民族地区的地缘和基础设施、投资软硬环境、外资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和外资利用规划几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 2.2.1 地缘和区位导致先天不足

地缘和区位要素对于承接外商投资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近年来,针对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中国区域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孙兵(2011)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中国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为其吸引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其中便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反观民族地区,毗邻中亚、南亚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远离资本输出国和国际市场,很难承接到大量、优质的外商直接投资。

### 2.2.2 缺乏良好的软、硬投资环境

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吸纳外商投资、促进地区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

从投资硬环境上看,中国民族地区分布于西南、西北边陲,地势复杂、自然气候恶劣,天然闭塞;由于历史原因发展落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交通不便,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国际资本的流入。单就公路建设而言,截止2015年12月31日,中国公路总里程为4577296公里,平均每平方千米公里数为0.48,而西部地区的公路总里程为5661667公里,每平方千米公里数仅为0.1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不同于西方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型社会”,偏好熟人交易,民族地区发展落后,市场化程度低,市场规则不完善,更是加剧了这类关系经济——与本地投资者相比,国外投资者缺乏天然的人情关系和政治联系;与其他国内投资相比,他们又欠缺寻找和疏通关系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国外投资者缺乏竞争优势,根本拿不到较优的投资项目。

同时,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有很多现象也不容忽视,如部分官员受晋升激励的影响,为追求在位政绩盲目引进外资,不管项目质量和是否符合自身发展实际;引进后不闻不问,使得投资者收益未达到预期;更有甚者,吃拿卡要、层层剥削,给外国投资者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缺乏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极大地阻碍了国外资本的流入。

### 2.2.3 自身实力弱,难以吸引优质外资,且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差

Balasubramanyam等(1996)认为,外商直接投入对一地区的增长作用是多方面的,对技术先进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不相同。郭庆然(2013)在利用中国数据实证检验FDI溢出效应对地区发展差异的

影响时也发现,由于各地区基础条件存在差异,消化吸收能力不同,FDI 溢出效应会导致发展结果上的差异。其中,影响 FDI 溢出效应的消化和吸收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市场竞争、人力资本状况、经济及产业结构以及金融发展水平。

如上文所言,中国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对外联系不够密切,市场化水平不高、市场竞争相当不足,同时,由于观念保守、落后,早年教育投资不足,民族地区的劳动力素质有限,加之近年来受“外出务工潮”影响,大量高素质劳动力涌入东部发达地区,加剧了民族地区高素质人力资本短缺的问题。

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从产业分布上来看(见图 3),较全国平均水平而言,2015 年,民族地区第二产业占主导地位,且主要集中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等生产效率低下、投入产出比低的行业,科技对 GDP 的贡献率并不高;同时第一产业仍占相当大比重,为 13.36%,远高于全国的 8.83%;第三产业中,零售、旅游及伴生的服务业贡献率不容忽视,占第三产业总产值的 18.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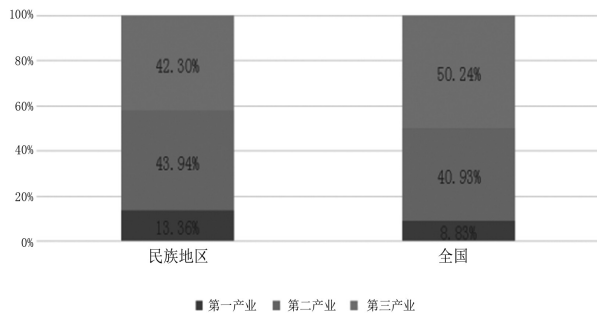


图 3 2015 年民族地区和全国的三产 GDP 贡献率对比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毫无疑问,外商投资的根本目的是寻找效率、市场和资源(Rajan & Hattari, 2012)。在这种状况下,民族地区能提供的有前景经济项目数量有限,很难吸引优质、资本雄厚的外商投入。虽然其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在改革开放早期,外商投资多集中于一些矿产品原石、粗加工的项目。近年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规范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定,限制矿产资源的直接出口,影响了外商投资的流入,也加剧了外资

投入不足的状况。

同时,由于自身实力太弱、对 FDI 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不足,甚至有部分地区未达到外资溢出效应作用的门槛,外商投资流入产生了资本的掠夺效应和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地区发展。

而且,研究表明,金融市场能够通过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技术进步、增加就业等渠道放大 FDI 溢出效应(丁叶,2013)。中国民族地区金融信贷市场发展不完善,也抑制了 FDI 的溢出效应。

#### 2.2.4 外资利用缺乏合理规划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除了内资企业的消化吸收能力以外,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也会影响 FDI 的溢出效应(何顺兰 2017)。中国民族地区在引进和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存在盲目性,具体表现为重数量而轻质量,忽略外资驱动发展方向与自身发展规划之间的差异,忽略投资方向自身的差异,引入不适合地区发展战略的外资。

### 3 合理利用外资的措施探讨

在“十三五”规划的指导下,如何合理利用外资,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脱贫,进而达到共同富裕,是需要认真考量的问题。同时,民族问题无小事,在利用外资进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

#### 3.1 合理利用外资的措施探讨

##### 3.1.1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硬环境

各地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础交通、水利及通信条件,改善投资硬环境,弥补经济发展的先天条件不足。同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扩大省际、国际合作,完善基础交通网络,建设综合性交通枢纽;综合发展海、陆、空运输途径,构建现代物流框架,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加强同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

##### 3.1.2 加大反腐力度,完善市场规则,改善投资软环境

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要有严格的市场制度作保障。在中央“反腐倡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地区法治建设,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用权,加强对相关岗位公务员权利的制约和用权的监督;做好普法工作,培育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法治意识,畅通群众监督和举报渠道,将整个地区纳入“反腐”体系中;同时,完善市场规则,公开、透明项目招标、投标过程,

推动关系经济向竞争经济转变,改善投资软环境,吸引外商资本投入。

### 3.1.3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程度,提高区域市场化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直接影响区域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外资利用率。提高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区域市场化水平,适度增加区域内的企业竞争,能够推动区域发展。国家相关部门可以考虑设立重点边境城镇、口岸及开发区,借鉴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设立民族自贸区等,并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

民族地区应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和外部区域的沟通、合作与联系,不断拓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市场。

### 3.1.4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由于地区闭塞、发展落后,早期教育投入不足,使得大部分少数民族人民学历不高、观念守旧,劳动力素质有限。这也导致民族地区吸纳的外资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等科技含量低、经济附加值低的产业。对此,应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解决女性受教育问题,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由政府出资,免费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中国高等院校要以市场为导向设置培养专业、指定培养计划,培育能满足中国发展需要的高质量人才。区域政府可以考虑制定相关政策,激励企业培养、聘用高层次的管理人才,鼓励创新;由政府出面引入高素质的专业人士,提升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以科学的方式谋求自身发展。

### 3.1.5 充分利用内资,承接区域产业转移,提高自身实力

发展不足、发展方式不当是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主要特点,也是存在的主要问题。(郑长德,2009)民族地区应结合自身特点、充分利用“洼地效应”,承接东、中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深加工、高新技术产业等高附加值的经济,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多有前景、有特色的投资项目,更好地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同时,承接产业也转移,也有利于高素质的劳动力回流,提高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提升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异地高考”和“春运”等社会问题,减轻东部地区社会的不安定性,有利于中国社会整体的和谐与稳定。

### 3.1.6 完善金融体系,畅通融资渠道

在谋求自身发展、实现脱贫转变的过程中,除了依靠国家政策倾斜和财政资金的投入,民族地区还应调整既有金融结构,完善自身的金融体系,优化区域内部的资本市场并加强同外部的联系,以传统融资方式为基础开拓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畅通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充分利用国内资本,合理利用国外资本,解决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扩大 FDI 的外溢效应,推动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 3.1.7 有选择地引入和利用外资,避免陷入外资陷阱

民族地区在引进外资的时候,要进行评估和权衡,不能一味的注重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忽略外资质量;同时,一定要做好地区发展规划,发挥地方优势、依托地方特色,明确利用外资的方向及地区产业发展的特点,结合自身的消化吸收能力,引进适度差距的外资,最大化发挥 FDI 的溢出效应,尽可能地规避其对内资的挤出效应和资本掠夺效应,促进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借鉴东部地区利用外资的经验,加强对外商投资的管理,规划外商投资布局,合理引导外资流向,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结合本地实际,因地制宜,发挥区域特色,坚持绿色发展,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 3.1.8 实行差异化的地区发展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利用辐射效应,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民族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其中,广西、内蒙古、云南三省因先天区位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发展起步早、产业结构较优等原因,经济发展比较好,对 FDI 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也比较强。可以考虑在民族地区内部实行差异化的发展战略,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实现区域优先发展。同时,加强民族地区间的沟通与合作,利用辐射效应,带动其他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发展、完成脱贫攻坚的任务。

### 3.1.9 国家政策导向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民族地区利用外资谋求自身发展,离不开法治和政策的监管及保障。目前,从宏观上看,虽然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对民族地区发展和利用外资等相关的问题做了规定,但太过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执行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效果上大打折扣;从微观上讲,部分地区根据自身情况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但由于政治晋升动机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具备短视特质,缺乏整体性和长期规划,而且,民族地区间的政策差异也会导致“弱者更弱”的发展状况,不利于区域合作。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出台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利用外资相关法律、规章和政策,为利用外资的产业、规模、方式、管控以及优惠政策等提供明确的指导思想,将民族地区纳入一个整体,并给予不同地区一定的自主权,让外资引入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运行。同时,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鼓励外商来民族地区投资。

### 3.2 利用外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引进外资、解决民族发展问题时,一定不要忽视民族团结和稳定等问题。在利用民族地区生产成本低廉、自然资源丰富等优势进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少数民族劳动力的劳动保护工作。由地方政府牵头,制定相关法规,确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标准,切实维护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强劳动法的普及培训,畅通维权渠道,倡导依法维权,从源头上避免因劳工纠纷引起的民族纠纷。同时,要注意外资引入过程中伴生的文化冲击,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抵御文化入侵。

#### 参考文献

[1] 何顺兰,周文婷.外商投资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溢出效应分析[J].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25-29.

[2] 李华敏,岳星星.FDI溢出效应、市场潜力与经济增长——基于西部地区2014年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2):76-82.

[3] 宋泽楠.“一带一路”背景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放型发展[J].广西民族研究,2015(3):142-149.

[4] 平新乔,赵维.少数民族吸引外资:历史、现状和落后原因[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5).

[5] 丁叶.我国FDI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性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3(6).

[6] 郭庆然.FDI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与吸收能力——基于门槛面板数据模型视角[J].工业技术经济,2013(8):33-43.

[7] 单德朋.民族地区贫困的测度与减贫因素的实证研究[D].西南民族大学,2013(4).

[8] 龚翼凯.我国FDI溢出效应的区域差异分析[D].重庆工商大学,2012(5).

[9] 孙兵.基于区位选择的区域发展差距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2):1-9.

[10] 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研究[J].民族学刊,2011(1):1-12.

[11] 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10):43-49.

[12] 李绪鹏,李忠斌.关于西部民族地区利用外资问题的思考[J].市场论坛,2006(4):24-27.

[13] 张建华,欧阳轶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对广东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3.04:647-667.

[14] Rajian, R. S. and R. Hattari. "How Significant are Intra-Asi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lows and What are Its Determinants?":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Emerging Asia. 2012.

[15] Balasubramanyam, V. N., M. Salisu, and D. Sapsfo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Growth: New Hypotheses and Evidence." Discussion Paper, EC7/9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Lancaster University, 1996.

[16] Borensztein E, Gregorio J D, Lee J W. How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5, 45(1): 115-135.

[17] Johnson, Harry G., "Survey of Issues" in Peter Drysdale, e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Asia and Pacific,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2.

[18] Macdougall G D A.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ment from abroad [J]. A Theoretical Approach, Economic Record, 1960(36): 13-35.

# Make Rational Use of FDI and Boost the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out of Poverty

WU Xihao, HU Enme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Province 570228, China)*

**Abstract:**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is the key to solving national problems. Among all the three kinds of capital investment, foreign investment could provide the basic development fund and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as well as bring the "spillover effect", which will help the nation area to get full use of the advantages of backward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leap-forward development. However, this kind of spillover effect of FDI has a series of fundamental thresholds.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DI inflow in the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including investment insufficiency and FDI abus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puts forwards several solutions.

**Key words:** minority areas of China; FDI; spillover effect; regional development